

# 走近大浪潮

——中国农村工业化模式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目 录

前 言 .....	1
主报告：走近大浪潮	
——中国农村工业化模式问题研究 .....	
一、概念、工具和框架 .....	1
二、中国农村社区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	17
三、改革以来的农村社区工业化过程 .....	59
四、必要的概括 .....	94
五、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	101
主要参考文献 .....	107
案 例 .....	113
向阳村 .....	113
福安村 .....	130
灰锅口村 .....	146

## 2 走近大浪潮——中国农村工业化模式问题研究

---

东陌堂村 .....	156
雁田村 .....	168
万丰村 .....	191
项东村 .....	209
段甲岭镇 .....	219
杨家庄村 .....	237
屯瓦村 .....	252
王壩村 .....	263

## 前 言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农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依然很高，农业中仍滞留了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深入，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问题，已更多和更主要地受制于农业外部和农村外部；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已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大力改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是中国农业和农村持续、稳定发展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前提。

中国农村工业化主要是依托原有的农村社区系统进行的，因而可称之为农村社区工业化。这种工业化源远流长。19 世纪 70 年代陈启源便倡导了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业。此后，农村工业化的浪潮便不断地在中国农村大地上涌动。20 世纪早期张謇所开创的南通大生企业系统，以及稍后的、更蔚为壮观的河北高阳土布生产，均为其不同时期的杰作佳构。只是碍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局限、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才未能在中国农村地区上演更加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百年来战乱频仍、列强肆意凌辱的历史，也为中国农村工业化带来了新的契机——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农村工副业也日渐繁荣，焕发出勃勃生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过程旋即便被人多地阻滞了，但在中国农村中始终延续着对工业化的向往、追求和发展非农产业的不懈努力，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此，即使在最困难的6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工业仍维持了1.1万个企业（当时称“社队企业”），4亿多元产值的规模；进入70年代后，中国农村工业更是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中顽强图存，且愈益壮大，其工业产值从1970年的6.4亿元，逐步攀升到1977年的380亿元，当时的农村工业产值已相当于全国工业产值的15%左右<sup>①</sup>。这已经是迄今为止诸多发展中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成绩。而在这一时期耗费了太高的社会成本才累积起来的工业技术、组织经验和相关知识系统，更是为后期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动力源。中国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对城市文明和近代工业的渴望与追求，曾是许多作家文学创作的主题。

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共中央宏观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后，中国农村工业化迅即形成了令世人瞩目的澎湃大潮。

面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诸多卓越表现，人们曾概括过许多种“发展模式”。但当我们今天再度回首时，有些“发展模式”已如过眼烟云，如耿车模式、阜阳模式，现已很少在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涉及；但也有一些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

---

<sup>①</sup>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国家统计局农村司：《中国农村40年》，第374页，中原农民出版社，郑州，198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79）》，第110页，国家统计局。

江三角洲模式，却有如常青树，至今仍具有很大的政策研究潜力和理论研究潜力。

有鉴于此，在本书中，拟结合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工业化具体过程，从较长的历史时段中，对中国农村社区工业化模式和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本书由主报告和 11 个案例组成。主报告和案例均主要以我们自己和其他学者前期据点调查成果为基础。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研究方式，主要是考虑建立在大量翔实、具体的个案研究上的综合分析，有可能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无庸讳言，以前期调研成果为基础的研究项目，在时效上难免有滞后之感；特别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环境变化很大，前期文献已难以全面、完整地反映迅速变化着的社会事实。为此，我们在近期展开的相关调研活动中，围绕本书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补充调查，由此形成的若干观点已经融入本书各部分。

本书所征引案例包括 11 个基本案例：江苏江阴市向阳村、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万丰村、广东东莞市雁田村、天津市武清县灰锅口村、山东烟台市福山区东陌堂村、山东青州市杨家庄村、辽宁海城市福安村、浙江苍南县项东村、河北三河县段甲岭镇、山西原平市屯瓦村和陕西商州市王壩村。这些案例在收入本书时，均按本书所商定的体例，对原作的有关内容做了取舍和文字改动。本着学术自由的精神，在基本案例的写作中，并不强求同主报告保持观点上的一致。另外，为了弥补若干方面的有关资料，本书还征引了 3 个补充案例，即安徽磬村、东涧村和四川莲村。

尽管在以往的调研活动中，我们未能对以上社区中的少数进行专访，但就这些社区所在的地、市而言，我们却几乎都亲自访

问过；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又曾尽量同原调查的主持者或参与者取得联系，就同本书主旨有关的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以期引述准确。期间，曾得到张泉欣、李静、张军、胡必亮、王晓毅、杨善华、程为敏、郭于华、高王凌、阮新邦、罗沛霖、李秀国、杜吟棠、刘燕生等人不同形式的、但都是十分重要的帮助。本书完稿后，张思骞曾协助统稿，并提出很多重要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作者主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室的研究人员。主报告由刘小京执笔，并对报告所提出的观点和结论负责；课题组负责人苑鹏，除负统筹协调组织责任外，还对报告初稿和修订稿提出重要修改意见。

# 一、概念、工具和框架

## （一）基础性概念

为便于读者对本课题中所述主题把握得更清晰准确，特在本课题篇首处将报告所使用的基础性概念作一些说明。

### 1. 社区

社区的基本定义是：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一般认为，社区至少应包括以下特征：有一定的地理区域，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并有着较密切的社会交往。在英文“community”一词中，含有公社、团体、公众，以及共同体、共同性等多种含义；而中文“社区”一词从20世纪30年代自英文意译而来起，便因其与区域相联系，而具有了相当深刻的地域含义，它着重强调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并有着较密切的社会交往的社会群体生活，是建立在一定地理区域之内的<sup>①</sup>。

---

<sup>①</sup>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第356～35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1年。

乡村社区是在“社区”基础上形成的概念。其基本定义为：生活在一特定地方上的一群人，有其共同连属意识，并透过组织与制度共享或共同参与一些有共通兴趣或共通利害的活动。它主要含有5种要素：(1) 一群以农业为生的人在一特定地方上过互有关系的生活；(2) 他们有相同的文化及社会价值；(3) 在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内参与共同行为，并遵循同一行为规范；(4) 有相当数目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组织，足以维持或满足其生活上各种需要；(5) 有带感情的共同意识，即感觉他们属于一个可与别的团体区分开的团体<sup>①</sup>。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向来有以镇为中心和以村（包括行政村和自然村，下同）为中心两种取向：一些受英国功能主义影响的学者多以村为基本分析单位，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等，由于种种原因，此种研究取向广为人知，因而不再赘述。而另一些受美国芝加哥学派影响的学者，则多以镇为基本分析单位。他们强调，乡村社区之内含与乡村发展甚有关系。盖须有一资源，有功能之社区始能举办各项事功，以满足其中人民之生活需要。人民生活日见复杂而现代化，其需要急剧增加。其所处社区须有力量与条件以应付需要并充实生活内容。在此意义中，一个单纯农村不足成一乡村社区。一个集镇亦不能离其周围农村而独存。必须集镇与农村相连合而后有服务，亦有服务对象。基于此种理念，20世纪前期，乔启明教授即曾在对南京附近江宁县淳化镇的研究中，划出一个以集镇为中心，包含其周围农村及小村群的乡村社区范围；杨懋春教授在

---

<sup>①</sup> 《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社会学》，第201～202页，商务印书馆，台北，1973年。

所著《中国之集镇与乡村生活》(The Market Town and Rural Life in China)和《一个中国农村》(A Chinese Village)两部著作及《中国之集镇区与乡村社区》一文中,也曾力主以一个集镇与其所服务之周围农村及小村群为中国之乡村社区。<sup>①</sup>

我们认为,在中国农村,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原本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农业集体化时期,公社体制更是将镇周边的村庄同具体镇的关系凝固化。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深度、广度和频率的增强,中国的村庄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开放性;与此相适应,农村精英、特别是工业精英的活动场所正逐步从村庄移向镇。镇在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农村社区边界扩大到镇及其辐射区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在本课题中,除为征引材料所述范围限制者外,我们将尽可能以乡镇作为基本的社区分析单位。

## 2. 工业化

20世纪中期,在“进化论”范式的指引下,西方学者曾经普遍认为,所谓工业化,一般指近代生产方式建立时期——即“使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和高效率工具的”技术和经济变革,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围绕这一过程,不单单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变,还包括脱离传统价值观念,趋向于强调实际与实利、一个人选择相标榜的“现世化”的过程。基于此,美国社会学家 W.E. 穆尔(Wilbert Ellis Moore)曾把工业化作为传统社会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的始发原因;并把工业化得以产生的条件归纳为4个方面:(1)在价

<sup>①</sup> 《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社会学》,第202—203页,商务印书馆,台北,1973年。

值观念上，由亲属优先（任人唯亲）的思想方法过渡到业绩优先（任人唯贤）的思想方法，以及建立在国粹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统一；(2) 在制度上，建立能够为经济生产而动员土地和资本的可转让的所有制，以及使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促进流通的商品交换系统；(3) 在组织上，建立专业化、金字塔式统制的科层制组织和得当的国家财政组织；(4) 在个人动机上，培养有创造精神的个性、业绩主义志向、向上的积极性以及对教育的渴求和活动热情。穆尔还指出，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经济组织、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将出现明显的变化：(1) 在经济组织方面，具有高水平的技术和受过高度训练的专家，广阔的市场和相互依存的组织结构；(2) 在人口结构方面，首先是由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死亡率降低所引起的人口爆炸，继而是随着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普及了家庭计划，实行人口控制、过渡到了低出生——低死亡——老龄型的人口结构；(3) 在社会结构方面，其特点是亲属群体和家庭的功能的缩小和解体，个人主义化的进一步加强，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控制的减弱等<sup>①</sup>。

在本课题中，我们将有限制地使用这一概念。这一限制主要集中在对原定义的“进化论”色彩方面。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围绕工业化而展开的社会变迁，不是传统和现代截然对立的两极，而是一个充满了传统和现代性互动和融通的复杂过程。

农村工业化和农村社区工业化都是在“工业化”概念基础上

---

<sup>①</sup>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第 1424～1425 页，第 1366～1367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88 年；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载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索》，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形成的概念。其中，农村工业化一般泛指在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社会经济的相应演进变化过程；而农村社区工业化更多地强调在具体社区中的上述演进变化过程。

此外，我们还特别注意到与具体农村社区工业化的实绩相伴生的农村工业化知识系统的存续过程。在本课题中，我们将给予中国农村薪火相传的农村工业化知识系统以很高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哲学家培根的名言对本课题主旨有着特别重要的关联。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 （二）理论工具

为使本课题在解析农业社区工业化问题时更具解释力和启发性，我们拟借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雷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和门德尔斯的“原初工业化”等理论来丰富本课题的基本分析框架。

### 1. 长时段

法国史学泰斗布罗代尔极其注重环境的作用。他在不朽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开篇处即强调，为了阐明地中海 1550~1600 年这短短一瞬间的生活，我们不能不涉及到前后其他时代的甚至现代的形象、景物和现实。就是说，要全力以赴地通过空间和时间展示一种演变缓慢而又能揭示永恒价值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地理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成了一种手段。地理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到最缓慢的结构性的真实事物，

并且帮助人们根据最长时段的流逝路线展望未来<sup>①</sup>。

基于这样的认识，布罗代尔将历史分解为几层平面——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并以此分别表示3种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

第一种运动是以世纪为基本单位的“缓慢流逝和变动的历史”运动，这是一种长时段的运动，一种几乎静止的、隐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悄悄的，当然是不惹人注目的）、几乎不被见证人和主演者觉察的、终究抵抗住时间的磨蚀并且始终保持原状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史。它几乎置身于时间之外、与无生命物打交道的历史。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变迁属于这一时段，自然生态环境的演进、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动等也属于这一时段。这是一种框架性的、“几乎不动的历史时间”，即所谓“地理时间”。在这一时间范围内，人们可以观察到人类历史演进的深刻内在运动。地理与生态环境的时间、文化与心态结构的时间、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时间属于这一层次。

在这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即所谓社会史，群体和集团的历史，与这一种运动相对应的是“社会时间”。这种历史常表现为社会的、经济的、人口的、文化的变动。这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力量，它们就像“深海暗流”那样“掀动”了社会生活。社会、人口、经济运动的时间属于这一层次。

第三种运动是个人规模的历史，即事件史的历史，与这一种

---

<sup>①</sup>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第20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

运动相对应的是“个人时间”。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一种迅速变化着的、有因其变化本身及其场面而引人注目的历史。如政治、军事、外交各种事件。对于亲身经历过这些历史的人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历史，人们涉身于这些历史之中，对其倾注了激情、失望、热爱、仇恨、想象与追求。这是一种以人的生命的自然界限来衡量与感受的历史。政治、军事、人物活动的时间属于这一层次。

在布罗代尔看来，传统的片面强调个人和事件的历史学歪曲事实真相，侵占业已流逝的时间，并在其中具有不真实的重要位置。使之称为一个奇怪的、缺少某个量纲的世界，这个世界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就像最轻捷的小船在激流的表面飞驶而过。这也是个危险的世界。为了避开它的魔法和巫术，我们必须事先弄清楚这些隐蔽的、往往无声无息的巨大水流，而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揭示它们的流向。引起轰动的事件往往只是这些宽阔的命运的瞬间和表象，而且只能用这些命运予以解释<sup>①</sup>。

布罗代尔指出，有各种不同的结构，也有各种不同的局势。这些局势和结构的延续时间也各不相同。历史学接受并发现多种阐述。这些阐述在纵的方向从一个时间“台阶”到另一个时间“台阶”，在每一级“台阶”上也有横向联系和相互关系。

## 2. 大、小传统

美国农民学家雷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提出，在比

<sup>①</sup>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第8～10页，第15～16页；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518～5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

较复杂的文化中，存在着两种传统——“大传统”与“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文明中，那些内省的少数人的传统”，“小传统”则指“那些非内省的多数人的传统”；“大传统是在学校或教堂中培育出来的，小传统则是生长和存在于村落共同体元文化的生活中”。这里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与“高度文化和低度文化”、“高雅文化与民俗文化”、“神圣文化和世俗文化”等，在意义上接近。雷德菲尔德认为，在两种传统可以区分的文明中，如中国和印度，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相互影响的，主要表现在正统的哲学、宗教等精致文化向地方流动，逐步“地方化”（parochialization）；而地方和区域的文化则向中央和全国流动，形成“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sup>①</sup>。

雷德菲尔德的上述理论架构，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及 60 年代曾成为许多乡民社会研究者的主导；并对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美国学者 D. 尼维森（D. Nivison）曾编过一本美国学者研究儒家思想的《行动中的孔子》，该书的献辞就是给雷德菲尔德的。华人学者陈荣捷在其著作《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中也曾提出，中国的儒教道教与佛教思想，归结起来就是大传统与小传统两种。此外，英国、美国和日本的人类学家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也都曾借鉴过这一对概念<sup>②</sup>。

在本土研究方面，李亦园教授曾积极倡导并力行将“大传统——小传统”概念运用于中国问题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大

①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第 156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7。

② 黄树民：《乡民社会序》，载沃尔夫：《乡民社会》，巨流图书公司，台北，1983；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第 156～157 页。

小传统的存在自古以来就有，所以其分野也特别明显。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代表较大多数一般民众的文化，它不仅在传统时代扮演一种提供大传统文化许多基本生活素材的角色，而且在当代的社会中也逐渐被认定是影响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sup>①</sup>。

不久前，梁治平先生又曾借助这一理论架构展开自己的研究。他认为，作为一种知识传统，习惯法属于人类学家所说的“小传统”，而与出自一般所谓“精英文化”的“大传统”相对应。习惯法是这样一种知识传统：它生自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由于这套知识主要是一种实用之物，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为实用理性所支配<sup>②</sup>。尽管在诸如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文化中，“大传统”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低估的。然而，同样明白的是，单从“大传统”入手又是不够的。在诸如“民法”这样的问题上，这种认识尤其重要。因为自唐、宋以降，中国社会内部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生活方

① 李亦园《人类的视野》，第14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② 梁治平还指出，习惯法是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地方性规范，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 and 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络中被予以实施。就其性质而言，习惯法乃是不同于国家法的另一种知识传统，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不同的原则。然而，作为“小传统”的习惯法从来都不是自主的和自足的，事实上，它是在与国家法在内的其他知识传统和社会制度的长期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由这里，产生了习惯法（广而言之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既互相渗透、配合，又彼此抵触、冲突的复杂关系。其结果，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界限也变得难以辨识。——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第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

面，出现了许多民间的交往方式。进入明、清以后，随着社会人口的急剧增加，这方面的发展更加令人瞩目。这种情形与国家法（首先是作为一种符号体系）的相对不变形成鲜明对照。而这可能意味着，对这一方面社会要求的满足主要是在“小传统”中求得。<sup>①</sup>

### 3. 原初工业化

原初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是美国学者门德尔斯提出的一种从近代工业产生以前的农村工业的发展中寻找近代工业化和工业革命前提条件的理论。该理论中的农村工业系指这样一种农村工业：（1）是面对地方市场以外的手工业生产。它既不是面向地方市场的、更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而是面向域外的、尤其是国外市场的生产活动。（2）是以农村为立地的手工业生产。其生产活动是由在农村的小农进行的家庭手工业，在很多情况下为城市的包买商所组织，采取包买商制的家内工业生产形式。（3）在同一地域经济圈内包括一个商业性农业地区，也即表现为同一地域市场圈以内农村工业区与生产率较高的大规模粮食生产之间的专业分工<sup>②</sup>。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本课题中，原初工业化一词的使用是受到相当限制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将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农村手工业繁荣都视为原初工业化现象，而是特指那些同中国工业化进程有着某种密切关联的农村手工业发展。

①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第126~127页；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再版序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

② 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第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